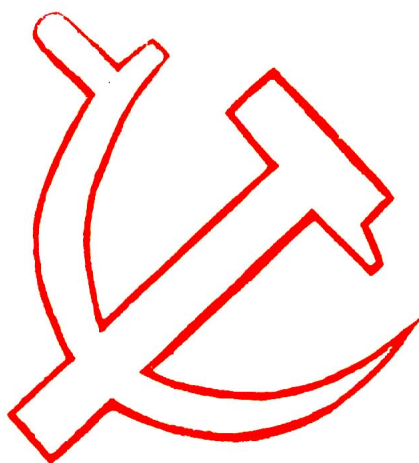


冠縣党史资料

第十一期



中共冠县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一九八四年八月

目

录

一、我的革命生涯 孙 洪 (1)

二、关于冠县早期革命历史资料回忆 钱文奎 (29)

三、在鲁西北十一年 刘 剑 (42)

四、战斗在家乡的土地上 曾广成 (52)

我的革命生涯

孙洪

一、走向革命道路

在一九三四年我正在济南正谊中学读书，这年学校放寒假后，我到了赵健民同志家里。那天他从济南一乡师还没回来。我就在他家住了一晚。第二天下午，健民同志回来了。吃了晚饭，到了梁堂村北的池塘边上，池塘结了冰，我们俩都面朝北，这时我正式向健民同志提出了入党要求。健民同志紧紧握住我的手说：“今后我们就是同志关系了。同志关系比亲兄弟和父母的关系还要亲。叫一声同志 要比任何称呼都亲密。入党后一是要保守党的机密，二是要 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我为什么到健民同志家里开诚布公的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呢？这要从头说起。

我于一九一四年生于冠县赵村。我的青年时代是在暗无天日的旧中国度过的。无论是北洋军阀，还是国民党蒋介石新军阀，都是一丘之貉，都是维护封建的剥削制度，都是残酷地剥削压迫广大的劳动人民，不管人民的死活。广大的贫苦农民更是生活在社会的底层。官僚豪绅和兵匪的剥削和劫掠，自然灾害（旱、涝、风）的肆虐，疫病的流行，使广大农民常年挣扎在死亡线上，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病不得医；遇到大的荒年则举家逃荒，流离失所，饿殍枕道，不足为奇。农村的贫困和疮痍令人触目神伤。这些都深深地刺疼了我年幼的心灵。我时常想：我成年以后也是这样生活吗？劳动人民就该受天灾人祸的折磨吗？寻找出路的想法在我脑海里萌生了。我十三岁那年，全家辛勤

劳动，节衣缩食，供我上了学。一九三〇年夏我考入了冠县一高，是十级。高小未毕业，三二年初我考入了济南五谊中学。我抱着由初中升高中再考大学的决心和幻想。但是黑暗的现实打破了我的梦想。那时候学生毕业即失业，在济南这样的学生多如牛毛。我从破产的农村来到都市求学，感到前途同样渺茫、无望，迫使我继续寻求自己的出路和归宿。

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动统治，民族危机的深重，全国抗日救亡和革命形势的发展，进步文艺的启迪，都对我的思想发展起了重大影响。在我们的同学中，也有不少是贫寒之家的子弟，共同的命运把我们紧紧联系在一起。我们在一起经常议论着所见所闻，所想的一切。赵健民同志对我的影响最深。在冠县一高时，我们是前后级同学，在济南时他在一乡师读书，我们经常接触，他待人诚恳朴实，平易近人，团结同学，关心时事，注重阅读课外书刊，善于思考问题，见解深透。他经常向我介绍进步书刊，诸如社会科学概论、读书生活、世界知识等书刊，并不断向我介绍和分析形势的变化，促使我走上革命的道路。这样，他对我也比较了解，知道我的思想发展变化和政治面貌。所以，我一提出入党要求，他立即热情地接收。那时候一般是参加党的外围组织——民先。我一开始就直接参加了党。后来，有人问我有候补期没有，填入党志愿书没有？我说这都没有。那时保密还怕保不住，怎么填表呢？也没填表，也没举行仪式。

在赵健民表示接收我入党，并进行了简短的党的知识教育后，还向我布置了发展党员的任务，叫我在所了解的同学中，对思想进步，家庭出身较好，社会关系比较单纯的人，吸收入党。我非常兴奋地说：“好，都记住了，坚决这样办。”在回家的路上，我反复地回味着健

民同志的嘱咐，又分析我最熟悉的同学和朋友中，谁对黑暗的现实不满，又富有反抗精神和斗争勇气，经得起斗争的考验。我想起了小化村的梁秀杰同学，他家境清贫，读书刻苦，团结同学，更可贵的是他关心时局的变化，国家的兴亡，对黑暗社会有强烈的不满。我认定他能成为坚强的革命者，便到了他家里，把他吸收为党员。事实证明，梁秀杰同志后来在残酷的革命斗争中表现出对人民的赤胆忠心，成为革命军队的一名优秀干部，后来随二野挺进大别山地区时光荣牺牲了。

寒假开学我回到学校。三五年暑假我由正谊中学转到惠商职业学校会计速训班。转考的原因就是想毕业后找职业。在惠商学校学些银行商业簿记。在三五年下半年经过调查了解找了一些入党对象。三五年下半年、三六年上半年这时期吸收的党员有王守信（济南人，老家在齐河）、沈秉乾、陈聚、王唯范、王凌云（女）。三六年上半年成立了支部。健民同志不断到学校去领导支部，向这些党员进行教育。这些同志的工作很积极。沈秉乾又介绍他的同乡王建民（历城县小学教员）入党。

三六年春天学校放春假，我骑自行车从济南到临清十一中去找王志浩同志。原来定的是我与健民同志一起去，他因为有事没去。在临清十一中，我和志浩同志谈了谈形势，提出准备吸收他入党。因为在一高的时间，我对他的情况比较了解。他表示同意。我跟他介绍了哪些要看的书刊。他也谈到十一中的同学吕文泉（冠县人），因买了一本读书生活就把他逮捕了。因为这本书封面上有红字，就认为有共产党嫌疑。此外志浩同志还谈到十一中有些同学思想比较进步等情况。我在那儿住了两天就离开回济南了。在我回去时健民同志就到了十一中找到了志浩同志，进行了正式的党的教育，吸收为党员。

二、在省委跑交通的日子里

一九三六年暑假，我在济南惠商职业学校会计速成班毕业后，当时担任地下党山东省委组织部长、济南市委书记的赵健民同志对我说：“组织上决定你担任省委的交通员，你先租两间房子，其他事情以后再说。”于是我通过熟人找到一个铺保，在济南市普利门外的太平街租到两间房子。按照健民同志的意见，我把自己的行李搬来。几天以后，健民同志领来一个学生打扮、操山西口音的青年人，对我说：“这位是北方局派来山东任省委书记的黎玉同志。今后我们三人都住在这里，公开的身份是亲戚朋友和同学，同在一起复习功课，准备考大学。”为了掩护，我特意把我们三个人用的书本和书籍拿出来，摆在枕头边和桌子上。我们住下来以后，黎玉、赵健民同志大部分时间是白天出去，晚上回来。当时，中共中央北方局设在天津。为了送报告和领取文件，我经常往返于天津与济南之间。虽然路程遥远，沿途又驻扎着国民党的部队，但没有出过任何问题。

这时候，山东省的地下党组织发展得很快，为了将领来的文件及时贯彻到各个特委和县委，省委决定买一部油印机，把领导的文件翻印出来。秘密印刷的地点在济南持志巷十二号的一间房子里，由共产党员徐宾、章士劳同志负责刻印和印刷。开始工作之前，黎玉同志对他们作了许多分咐，然后说：“力争工作不出问题，万一暴露了，就照我说的办，打死也不能改口。”秘密印刷工作一连搞了三个多月，都很顺利，每当我把需要翻印的文件交给他们，又把他们翻印好了的文件带出来，秘密送到各个组织，想到这些文件将会产生巨大的力量，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农历八月初七下午，黎玉同志对我说：“特委书记会议明天上午

散会。明天下午十二点，你去把翻印的文件取回来，由各特委书记亲自带回去。”

第二天中午时分，我来到擗面巷十二号时，情况起了变化。只见徐宾、章士劳同志住的那间房子窗户紧闭，门上了锁，而不是按照组织规定的暗号窗户开一扇，关一扇。我正急得发呆，认识我的男房东惊慌地走上来，低声问我：“你碰到警察了吗？”我说：“碰到了，在前面不远的地方碰到了几个警察。”房东说：“他们不认识你，不然你也危险了。你的同学徐宾、章士劳被警察抓走了，还带走了他们的油印机和印的文件，警察是大清早来的，一直搞到现在还没有吃早饭。刚才，是我叫他们去吃早饭的。他们临走时交待我，如发现有人来找徐宾和章士劳，不管是男的女的，要我把人留住，等他们回来把人交给他们。孙同学，你快走吧，等会警察回来你就走不脱了。”我告别了房东，赶快走了。

徐宾、章士劳同志这次印刷的文件很重要，上面写有红军胜利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达到延安的详细经过，有两篇关于动员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的文章。因为文件的内容比较长，他们工作了一个通宵，还没有完成任务。八月初八早晨，天下着雨，他们认为雨未停，敌人不会来搜查，就继续印文件，结果暴露了。敌人搜到了这些文件，如临大敌，立即全城戒严，气氛十分紧张。

我找到赵健民同志，将上述情况告诉他。健民同志说：“太平街不能住了，得马上搬家。”因为在住房问题上事先有所准备，我们立即搬到了丁家崖租好的一间房子里。健民同志对我说：“秘密印刷暴露的事，黎玉同志还不知道，今天下午他很可能去擗面巷。我马上去擗面巷南口，你去北口，挡住黎玉同志。”他说罢，我们便急速分头出发了。可是我们一直望到天黑，还没见黎玉同志的踪影。他发生了

什么危险了吗？我们心里非常着急。

省委曾经决定，如果出了什么问题，以民众教育馆作为第二个秘密联络点。第二天清早，我和健民同志急步走到大明湖畔的民众教育馆，才和黎玉同志接上了头。对于秘密印刷被破坏的情况，黎玉同志大致知道，听了我们的详细汇报后，他说：“莱芜有两个人叛变了，你们两个要赶快离开济南，暂时转移到长清县去。徐宾、章士芳两同志被捕以后的情况，我先派人打听一下再说。为了防止意外，还要派人把昨天发生的情况告诉各特委，这事由我负责安排。我也要马上离开济南去北方局开会，半个月以后，我回来与你们联系。”话后我们便分了手。

八月十一日晚上，我再三催促健民同志赶快离开济南，他说：“现在不能走，还有两件事要办。第一件事，明天早饭后你去第一师范把刘清禄同志叫出来，要根据当前形势所采取的斗争策略向他交代清楚。第二件事，要等明天淄博的同志来了，把下一步工作安排好。”

刘清禄同志是第一师范党组织的主要负责人。第二天早饭后，我到一师把刘清禄同志叫出来与健民同志见了面。就在他们两个谈话之后由于叛徒告密，健民同志在大街上被捕了。赵健民同志被捕后，由林浩同志接替他的工作，担任省委组织部长兼济南市委书记。

我在长清县待了几天时间，济南的紧张局势稍有缓和，又回到了济南。秘密印刷被敌人破坏以后，为了使上级党的文件及时传达下去，在绝对保密的原则下，由几个同志夜以继日的抄写。有时遇到紧急文件不能按时抄写完就会对党的工作造成损失。因此，省委决定由我负责开设一个小饭馆作掩护，把秘密印刷工作恢复起来。在白色恐怖下用开饭馆的方式掩护党的联络工作，是个很好的办法，我们的领导干部和交通员都可以用上饭馆吃饭的方式，出进我们的秘密联络点。我回忆

起在正谊中学读书时，所结识的一个饭馆老板叫王德胜，与我比较要好，后来由于本小利薄，加上国民党苛捐杂税的盘剥而亏损关门，还乡务农去了。经组织同意，我走访乡里，找到了王德胜，他一家四口都乐意与我合伙在济南开饭馆。由党组织资助经费，小饭馆便开了张。于是，又买来一部油印机，正式恢复了秘密印刷工作。我名义上是饭馆的掌柜，实际是做党的工作。每天晚上，我抓紧翻印文件，刻写、油印都由我一个人完成。白天忙于做交通工作，还兼管济南市部分党支部的组织工作。王德胜负责掌勺炒菜，经过党的教育，他进步很快，两个月后就被发展为共产党员。王的爱人负责内务、买菜、洗菜、做包子。王的两个儿子负责跑堂。他们一家四口干得挺欢，表现很好，对来饭馆联络工作的同志十分诚恳热情。大家都说：“一进饭馆，就好象回到自己的家。”这个小饭馆，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办到一九三七年五月，由于革命形势的变化，加上秘密印刷已转移到济南书店，就停办了。

前面说的徐宾、章士劳、赵健民同志被捉后的情况是：徐宾同志始终按照黎玉同志事先嘱咐的话回答敌人，他说：“我是濮县作买卖的，来济南了解市场行情，顺便探望一个亲戚，根本不知道有什么共产党。”敌人问徐宾同志谁是他的亲戚，他随便说了个名子。并说由于多年没有通信，亲戚的住址不详，一直没有找到。敌人问他为什么与章士劳在一起帮共产党印文件，他说因为自己识字不多，辨别不出是共产党的文件还是国民党的文件。看到章士劳年纪小，推油印滚筒推不起，便帮他推了一阵油印滚筒。敌人多次审讯，严刑拷打，他始终不改口，只关压三天就释放了。

章士劳同志年纪仅十八岁，身材矮小，看去象个十五、六岁的孩子。因为国民党的法律有一条，不满十八岁不判刑，所以他按照黎玉

同志嘱咐的，说自己只有十六岁，国家境贫寒，无处谋生，才买了部油印机帮人家印点东西，维持生活。敌人问章士劳帮共产党印过一些什么文件，他说：“我开业以来，大都给济南街上的老板们印点表格，只帮共产党印过这一回。”敌人又问他这个文件是什么人送来的。他回答说：“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子送来的。开始我不敢刻印。那老头子说给我五元大洋，我才答应。约定初八上午八点拿钱来取文件，可是你们清早就来了，害得我白白辛苦了一晚。”

不管敌人怎样软硬兼施，章士劳同志始终不说其他的事，关了九个多月也释放了。以上这些情况，是他俩出狱以后对我说的。

赵健民同志被捕后，国民党的山东省政府得知他是共产党的省委组织部长兼济南市委书记。立即在敌人中间引起很大震动，整个济南市的大街小巷戒备森严，国民党的省政府和市政府周围，军警蜂拥，架起了好几挺机枪。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亲自出庭审问，想从赵健民口中获得我党的重要情报，妄图把山东地下党组织一网打尽。但是赵健民同志根本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只说自己参加过冯玉祥组织的抗日救国会。敌人把两个叛徒带到法庭上与赵健民同志对证，赵健民同志说不认识他们，骂他们乱陷害人，搞得敌人狼狈不堪。

这帮刽子手恼羞成怒，对赵健民同志严刑拷打了三个来月，但始终未能动摇他的革命意志。韩复榘无法，只好将健民同志转到济南高等法院看守所长期关押，直到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以后，中日战争全面爆发，才将健民同志作为政治犯释放出来。

芦沟桥“七·七事变”发生以后，由于蒋介石实行不抵抗政策，日寇疯狂地大举进攻，北平、天津相继失陷，北方局从天津转移到太原。于是我又担负由济南到太原这一线的交通员。当时，虽然实现了国共合作，但国民党对共产党是口蜜腹剑，许多革命者仍不断遭到国

国民党特务的暗杀。针对这种情况，黎玉同志在交代任务时嘱咐我：“从山东到太原是一条新的交通线，路途遥远，情况复杂，一路上你要倍加小心，千万不可疏忽大意。现在北方局通知我们去取文件，考虑你是老交通，有一定的斗争经验，省委决定把这个任务交给你。”接着他把接头的暗号告诉我。

第二天，我带着山东省委给北方局的工作报告，乘上火车，三天以后顺利到达太原。按照北方局的通知，找到了正泰旅社。那时大一点的旅社设有用小木板制作的旅客姓名牌，我在正泰旅社住下来以后，老板就在服务台黑板上挂上了我的姓名牌和住房号码。我是老交通，北方局早就知道我的名字。第二天上午，有个二十多岁、头戴博士帽，身穿浅蓝色府绸长衫的青年人，手里拿着《晋报》走进来，我一看这人的打扮和手里的《晋报》，完全与黎玉同志说的一样，估计是与我接头的。为了慎重起见，我没有马上打招呼，仍坐在床上看书。直到青年人按规定的暗号问我：“先生，何时来的？”我才高兴地站起来和他握手，说：“是九日上午十点到达的。”说罢，我拉开小皮箱的夹层底板，从里面拿出山东省委给北方局的报告，送给那位同志。接着，他与我约定第二天接头的时间。

八月十一日上午，日寇的十八架飞机在太原狂轰滥炸，大批房屋倒塌，无数同胞被炸的血肉横飞，整个太原市一片恐怖和混乱。目睹日寇的罪行，更加激起我心头的民族仇恨。在国家存亡的紧急关头，国民党纷纷南逃，中国人民把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在正泰旅社，人们议论纷纷，大家一面痛骂日寇的法西斯罪行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一边高兴地说：“听说共产党的付主席周恩来来了，八路军的付总司令彭德怀也来了，这就好了，太原有救了，山西有救了！”大家还说过几天周恩来付主席准备在太原召开群众大会，亲自作全民总动

员抗战到底的报告。我听到这里，一股暖流涌上心头。我是多么想在太原待几天，亲自听到党中央的声音，见到我们党的领导人啊！可是，时间紧迫，身负重任，不可能啊！

八月十二日下午，与我接头的年青同志准时来到正泰旅社，把一包密封的文件交给我，对我说了几句一路小心的话，就走了。我赶忙把文件装在小皮箱的夹层底板下。因为黎玉同志是山西人，很想知道家乡的抗日消息，要我给他买几张《晋报》带回去。一切准备好了，十三日吃完早饭，我便乘火车离开太原。

傍晚时分，我在石家庄下车，准备转车回济南，可是，我去买车票时一摸口袋，钱荷包不知什么时候被人扒走了。无钱买车票，我怎样回济南呢？借钱吗？人地生疏，举目无亲，求借无门。电报等组织上寄钱吗？一来连拍电报的钱都没有，二来北方局交代我，文件十分重要，必须在明天一早送交山东省委，时间不允许。我考虑了一下应付意外的办法，就混在旅客中上了火车。到邯郸时列车员一查票，就把我查出来了。警察立即把我带到列车上一间小房子里，七、八个人先轮流在我身上搜查了好几遍，然后把我的皮箱打开，翻来翻去只有两件换洗的衣服和几张《晋报》。他们把几张《晋报》对着电灯泡，反反复复地照来照去，我知道他们是想从报纸上发现什么密码、密信之类的文件。这时，一个警察看到我头戴博士帽，身穿府绸长衫，便对我说：“看样子，你不象个穷人，怎么乘车不买票呢？”我说：“钱荷包被人扒走了。”又一个警察问我：“你是哪里人？干什么的？”我说祖籍山东济南，在太原经商做生意，回济南探亲。另一个警察又问：“你有身份证吗？”我说身份证放在钱荷包里，一起被扒走了。“警察们没有从我身上捞到什么，一齐对我大发脾气：“没钱不能坐车，下去！”然后猛地一推，把我推下火车，一下摔在铁轨旁边的碎石上，

手和脚都摔伤了，但我心里十分高兴，因为文件没有被查出来。

我忍着伤痛，走进邯郸街上的一家旅馆，向老板说出了钱包被扒的事，请他帮忙，把箱里的两件换洗衣服卖掉，才买了一餐饭吃。从邯郸到济南，还有相当远的路程，没有钱怎么回去呢？为了把文件明天一早送交省委，晚上八点左右，我又偷偷爬上了火车。根据上回的经验教训，看到乘务员来车箱查票时，我就装着上厕所，走到另一个车箱，等乘务员到另一个车箱查票时，我又找机会坐在刚才查过票的车箱里。就这样，终于躲开了查票，第二天黎明时回到了济南。

三、组织抗日武装

我从太原回到济南不久，北方局为了广泛开展抗日游击武装斗争，分派给山东省委一批八路军干部，其中有位红军干部廖云山同志被派去鲁西北特委，黎玉同志要我负责护送，并嘱咐我回来时，去冠县看望赵健民同志（这时赵健民同志已出狱，组织上让他回家养病并看望母亲）。从济南到临清有三百多里，沿途驻扎有好几股国民党军队。为了保证安全，我俩走的全是偏僻的乡间小路，转来转去，三百多里路程，实际走了五百多里。三天后到了临清政训处，运北同志正在那里，还有王乐亭同志，他穿着军衣，也是政训人员（他现在在贵州）。我把廖云山同志交给运北，完成了任务（廖又转去冠县，最后到了聊城）遂我离开了临清，回到了冠县。我找到赵健民同志。他的伤还没有完全好，身体仍然十分虚弱。但他一见到我，就表示马上一道回济南省委工作。我们约定好时间，一起到聊城，见到了省委派到鲁西来的代表张霖之同志，他告诉我们：济南已在三天前沦陷，山东境内的黄河两岸已被日本鬼子封锁了，省委机关已从济南迁到鲁中山区的莱芜一带去了。中央的指示精神是：共产党员就地组织游击武装，开展游击战争。你两个不要回省委机关了，就在冠县组织游击队。对省委

那边的联系我负责。我给发报就说你们两个留在鲁西北，不回省委机关了。他还说：“健民同志回冠县，锡恩（即我）同志到濮县去一趟，跟濮县特委进行联系，看那边的情况怎么样。”

听了霖之同志传达上级指示精神后，健民同志第二天就回冠县来了。我到了濮县见了刘宴春同志。我把霖之同志关于组织游击武装，开展游击战争的精神跟宴春同志讲了。宴春同志把那边的情况也谈了谈，他说那边也是很混乱，党也准备组织游击队。我就又回到聊城，把情况跟霖之同志讲了。霖之同志对我说：你回冠县去吧，和健民同志一起组织游击队。路上可能不好走，组织起来的一些游杂武装纪律很坏。这样我又回到了冠县。

健民同志回到冠县，立即召集地下党员郭英、郭林业、许梦侠、王志浩、梁秀杰、朱月同等同志，领导组织游击队。一开始比较顺利，动员了四十多名队员，二十多条枪，住在八里庄崔老可家。这时在冠县拉起两大股土匪武装，即南杆韩春河，北杆石洪典，他们发展比我们快，他们是土匪性质，（当然，队伍中有很大部分是贫苦农民，是为抗日或生活所迫参加的）群众有枪的不敢不给他们。我们呢，是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不抢不砸，人员和枪支都是动员的方式，宣传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抗日救国。人家有枪不交咱也没法。最后发展到了百人左右、五十来条枪时，就没发展前途了。冠县一带的枪都叫南杆和北杆收完了。南杆韩春河发展到三个团，北杆石洪典发展到三个团一个营（陆子恒组织的一个营，后为范筑先的卫队营）。

我们党领导的这支游击队当时叫“抗日自卫军第九队”。我记得这时与韩春河取上联系，共同研究命名的，反正得立个名目，得有公章，得取得合法地位，得教老百姓拿给养，不然土匪就合并你，吃掉你。群众见我们都是些学生，又称我们为“学生杆”。我们成立后真

正起到了抗日游击队的作用，就是三七年冬日军第一次路过冠县城时，城里的汉奸——维持会头子开会欢迎日本人，等日军离开县城后，我们把这几个汉奸头子捉住，拉到东关枪决了，震动很大，给冠县当汉奸的人以迎头打击。

回忆我党初期组织抗日武装，以健民同志为首的绝大多数党员，坚决执行中央指示精神，就地组织抗日游击武装，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也有极个别的党员如冯干才，丧失信心，动摇逃跑。我和健民同志曾对他进行批判教育。那是在县城南关东边的一个店里，那儿正摆着一辆大车。我们都站着，冯干才低着头。健民同志耐心教育他：中央指示精神是叫组织游击队，坚持敌后游击战争，你向哪里去？这不符合中央指示精神嘛！我接着说了一句：共产党员在这时候应该表示坚强，不能逃跑。但最终也没把冯干才挽救过来，他脱离了革命行列，成了可耻的逃兵。

总结这一段的历史，有好的经验，也有教训要记取。当时以健民同志为首的大多数党员对组织抗日武装，积极性很高，做了很多工作，成绩也很大。但是不够的地方是，没有广泛地把冠县的党员集中起来，只是把城周围一带的党员如许梦侠、郭英、朱月同、梁秀杰等同志召集起来，但与东北辛集一带的党员郭芳臣、鲍廷干、于少奎没及时通气，力量小了。郭芳臣、鲍廷干、于少奎他们把辛集、贾镇一带的枪支掌握了。假使两部分队伍结合起来，人多了，枪也多了，可能组织一个营，再进一步发展，力量会更大些。为什么郭芳臣他们被北杆合并了，就是因为力量小嘛！

正当我党组织的游击队感到无法再发展的时候，三七年阴历年前范筑先专员把南杆和北杆收编了，北杆编为第五支队，南杆编为第六支队。这时候开了一个会（在那儿开的会我记不清了），做出决定。

这些党员有到五支队的，有到六支队的，有到陆子恒卫队营的，有留在地方的。健民同志到六支队去，在那里不久代替他叔当了三营营长。赵三营就从这儿开始了，这是我党掌握的武装。其他的同志就是做政治工作，还没有掌握武装的实权。我到五支队去就是做政治工作。五支队开展工作一般地说还好开展，郭芳臣同志当参谋长，他还有这个权。另外五支队的党员还有沙延孝、许树菱、许乃昌、郭兰周等同志。五支队的党员多一些（郭兰周后来因不遵守纪律，又是抢又是砸，被枪毙了）。

郭英同志留在了地方。三七年底到三八年初，他对汉奸、亲日分子实行了坚决的镇压，组织农会，发展党的组织，为创建冠县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基础。冠县这块抗日根据地始终比较巩固，象供应粮食，收养伤病员，出干部，起到了根据地作用。

三八年初，五支队就调往聊城，住在西门里，那时发给了军衣。这时，大批平津流亡学生（内有地下党员，多是进步青年知识分子）以及本地区青年知识分子到专区政训处，要求抗日救国参军参战。由政训处统一分配到各个支队（这时一共是三十二个支队，还编了四个旅）五支队政训处，团、营、连政治干部很快就充实健全了。鲁大东、宋子兴、崔玉甫、郎勤章（又名郎善文）这四个同志来到了五支队，他们都是馆陶人。沙延孝同志也来到五支队，他到一团当政治部主任。宋子兴，还有一个刘健农同志任营教导员。这些同志一到部队工作都很积极，做出了一定成绩。连队都派了政工干部。政治工作内容，主要是进行抗日救国形势教育，找班长排长谈话，开展文化娱乐活动，唱抗日歌曲和上识字课。

这期间在这些青年知识分子中吸收了一批党员。那时候发展党员还是比较慎重的，把入党对象的家庭情况，出身历史进行了解，进

行几次教育再正式介绍入党。最早发展的有鲁大东、杨寿恒同志。鲁大东那时叫王化亭。他离开五支队去馆陶任县委书记，是模范县委书记，后来曾参加党的“七大”是“七大”代表。其他同志象宋子兴入党晚一些。

那时候在部队开展政治工作阻力很大。五支队营连以上军官绝大部分当过土匪或是旧军人，他们对教导员和指导员的工作是不支持的，并说政治工作是狗皮膏药，指导员是吃闲饭的。有个别政工干部不愿在连队工作，工作没办法开展，经过说服教育后仍然回连队继续工作。政训处经常召开政工干部会议，汇报团、营、连政治工作情况，一方面了解下情，另一方面对政工干部互相学习、启发有很大好处，因都是刚参加工作的干部，没有什么经验。我们多讲些党的主张、政策，把共产党的光荣形象在政工干部中牢牢地树立起来，打下发展党的良好基础。

五、六支队相继撤离冠县后，由我党领导下的十支队驻守冠县。五支队在聊城待命期间，营、连以上过去当过土匪或是旧军人的军官，少数人仍然匪性不改，不断回冠县境内抢掠、敲诈群众。一团三营长周进贡系惯匪，他身边经常有三十多人跟随，耀武扬威回冠县境内扰乱。当地群众向十支队告发，十支队派人去捉拿，周匪带着人枪投靠日寇当了汉奸。

旧军人中也有些进步的，例如 四连的连长过去和红军作过战，了解我党的政策。这个连的指导员张兆汉工作很踏实，对连长的工作做得不错。这个连长和张兆汉的关系很密切，观点一致。指导员上政治课讲形势，唱救亡歌曲，连长都大力支持，并踊跃参加政治课。指导员到政训处汇报情况时，这个连长也一起去谈对形势看法。这个连长后来要求进步被吸收为党员，以后在艰苦的行军打仗当中表现很好。